

利瑪竇與北京 相關資料匯編

首都圖書館信息諮詢中心

2006年4月7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利玛窦到汤若望:晚明的耶稣会传教士/(美)邓恩著;
余三乐,石蓉译.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1
ISBN 7-5325-3305-0

I. 从... II. ①邓...②余...③石... III. 基督教
史-研究-中国-明代 IV. B97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84577 号

Generation of Giants:

The Story of the Jesuits in China in the Last Decades of the Ming Dynasty

美国印第安纳州 Notre Dame 大学出版社 1962 年出版

从利玛窦到汤若望

——晚明的耶稣会传教士

[美]邓恩著

余三乐 石蓉译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guji.com.cn

总发行所 上海发行所发行经销

商务印书馆 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 × 1092 1/18 印张 21 $\frac{12}{18}$ 插页 7 字数 400,000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25-3305-0

K·435 定价: 48.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公司管理部联系。T: 56628900 × 813

情,见本书第七章。——译者注)

① *Opere storiche*, II, 109 页。

② 同上书, 118 页。

③ 在 *FR*, I, 108—132 页中, 载有关于利玛窦对中国宗教的分析。

④ *FR*, I, 337 页。

⑤ *FR*, I, 338 页。

⑥ *FR*, I, 298 页。

⑦ 金尼阁著 *De Christiana expeditione apud Sinas suscepta ab Societate Jesu, ex P. Matthei Ricci ejusdem Societatis Commentariis...* (1615 年出版), 254 页。

⑧ 同上书。

⑨ *FR*, II, 341 页。

⑩ *FR*, I, 339 页注 1 中, 谈及石星的身份。

第三章

利玛窦主持工作

利玛窦离开了韶州, 向北京进发。他想, 即使北京去不成, 也要在南京站住脚^①。可是当时的时机不好。当时正值 1592 年 5 月, 日本的丰臣秀吉在还没有完全打破封建领主割据局面, 日本尚未完全统一的情况下, 竟然组织了一支三十万人马的军队出兵朝鲜, 为实现他理想中的日本帝国之梦——把中国、印度、菲律宾和西南太平洋诸岛归日本版图, 迈出了第一步。仅仅在六个星期之内, 他的军队就横扫朝鲜半岛。一支由八万人组成的中国军队, 被派往朝鲜协助抵御日本人, 结果也遭到了失败。

日本军队在尝试最初的胜利之后, 便开始走下坡路。在海战方面, 朝鲜杰出的海军将领李舜臣接连地给予日本军队以重创。再加上日军的战线拉得过长, 当地游击队的牵制, 还有地方百姓对侵略者的仇恨, 以及恶劣的天气、部队供给的不足等等, 多方面的因素加在一起, 逐渐消磨了日本人的锐气。对中国来说, 尽管时局有所好转, 但是明军在朝鲜的失利, 加上日军也并没有从朝鲜撤出, 这些都深深地困扰着朝廷。万历皇帝把那些他认为有能力统领军队的官员召到北京, 一起来商定对付入侵者的作战计划^②。于是, 为抵御入侵而动员的军队集结起来, 为大规模的战争做准备的各项工作也正在进行中。北京的这种战争恐怖气氛感染了全国, 利玛窦在 1592 年 11 月 12 日写给耶稣会总会长阿桂委瓦的一封信中, 谈到了当时人们害怕日本人的情绪。在信中, 他把日本人描写成“非常好战的民族”^③。

南京的气氛自然受到北方的感染, 显得躁动和不安。在这～种形势下, 当地的官员们是不欢迎一个外国人出现在他们中间

的。1595年5月31日,利玛窦到了南京,一路之上充满了惊险和不幸。当他们航行到一个叫十八滩^①的地方时,船在急流中翻覆了。一名水性很好的年轻教士巴若庵(Barradas)^②溺水身亡,而不习水性的利玛窦却幸运地保住了性命。

在当时这种环境中,利玛窦还是找到了机会。他发现肇庆巡抚刘节斋的第五个儿子在南京。这位刘公子很高兴能与这位天主教徒再次相见,并设宴款待了他,还把利玛窦介绍给他的朋友。这些人又宴请利玛窦。他们之间的这种来往,无形中使东方与西方的文化在一种很友好的气氛中展露出来。这对于双方,无论是对有开阔视野的人文主义的意大利人,还是对那些接待他的开明的中国人来说,彼此间都产生了一种信任感。

尽管利玛窦在南京结识了新的朋友,在衣着、语言和行为上已经十分中国化了,他因此而自认为住在南京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是没过多久,他这种打算还是落空了。利玛窦得知他的一位老相识徐大任在南京很有地位,有一天,就前去拜访。席间,利玛窦说他打算在南京住下去。听了这番话,徐大任与利玛窦刚见面时友善的态度改变了,变得十分恐慌。原来这位大人害怕因为与利玛窦交往而使自己陷入困境,怕为帮助一个外国人而丢官。他极力让利玛窦离开南京,并向利玛窦担保,除了南京,去任何地方,他都能帮忙。这位将与利玛窦的友谊抛之脑后的徐大任,抢在官府之前,将利玛窦住的那家客栈的倒霉的老板找来。他装作非常愤怒的样子,命令店老板把利玛窦轰出南京。

尽管利玛窦一些朋友一再劝他,不要理会徐大任的这种做法,但是利玛窦仍然认为,勉强住下来会对以后的发展不利。6月17日,心怀深深失望之情,但并不悲伤的利玛窦离开了南京。他在南京停留了仅仅两个星期。事后,利玛窦善意地解释了徐大任的行为,他说:“我被告知,正如徐大任所说的,他这样做是为了我好。但是就我对定居南京所抱的强烈愿望来说,宁愿被投进监狱,我也不愿意离开南京。”^③

利玛窦不希望再回广东去,所以他就决定在江西省的首

① 十八滩是赣江位于赣州与吉安之间的一个险滩。

② 巴若庵(1570—1595),澳门人。

府、以有众多学者而闻名的南昌落脚。利玛窦从南京走水路赴南昌,路上他结交了一个同行的旅伴,这个人在江西的衙门里做事。1595年6月28日,他们到了南昌之后,是这位新朋友照料他,帮他找了住处,看着他安顿下来。

开始时,利玛窦的名字在南昌并不为人所知。翟汝璣向他在南昌的许多朋友们夸奖利玛窦。利玛窦也通过一位名医王继德开始与城里有修养的阶层结交起来。一次,利玛窦受王医生之邀赴宴,来客中有两位皇亲^①。利玛窦对中国经典著作的熟悉就像他的数学知识一样,激起了在座来客的赞扬。利玛窦很快与这两位皇亲成了熟人。以这次宴会为良好的开端,利玛窦的交际圈迅速扩展了,登门拜访的人也不断地增加。许多来拜访利玛窦的人渴望见识利玛窦真实的、奇异的记忆能力。中国的科举考试制度导致了记忆力的高度发展,但是很多中国人还是被利玛窦的记忆能力所折服。因为他能在读了一遍四百个不相关的汉字之后,不但能顺着将它们背下来,还能倒着复述出来^②。为了让那些羡慕他的朋友也能学到这一本领,他写下一篇关于记忆的短文——《西国记法》。

江西巡抚陆万垓在对利玛窦的情况做了初步调查后,派人召利玛窦前来。而谣传却说总督要传利玛窦过堂。利玛窦的房东和邻居们听说后吓坏了。房东想将利玛窦连同他的东西一起赶到大街上去。但是利玛窦由于得到总督的私人医生王继德所作的关于总督对他有好感的保证,所以拒绝房东的武力要挟。尽管如此,利玛窦还是自愿搬到了医生的家里。

虽然有这位医生朋友的一再保证,利玛窦在会面前还是充满了疑虑。等他见到总督之后,见到总督对他非常客气,也不让他履行中国人见官时的跪拜之礼,利玛窦的心才算放了下來。接下来总督向他询问了一些关于天主教教义的问题,又问了他所教授的数学方面的一些事情。在见面结束的时候,总督对利玛窦的盛赞,竟然使利玛窦感到局促不安。总督一再邀请他留在南昌。

利玛窦在南昌站住脚是没有问题了。总督对利玛窦的态度

① 指建安王朱本和和朱本立朱本珍。

使那些原来想对外国人表示友好但又害怕的人松了口气。利玛窦马上就对一些职位重要的官员进行了一连串的拜访，并且都受到了友善的接待。前来拜访他的人也比以往增加了好几倍。几个月以后，利玛窦忙得连在白天读每日祈祷书的时间都没有，只有等到夜里再补上。

他在1595年10月28日写给高斯塔（Girolamo Costa）¹的一封信中说：“我连吃午饭的时间也没有，往往是下午一点钟才吃上。”他还写到：“一个星期里，我要受到两次或三次的赴宴邀请，有时一天里要赴两个地方，我也不得不两个地方都去……教会的斋戒日对我略有不便。因为这里的盛宴多在晚间举行，而我的守斋是全天的，值得庆幸的是我的消化系统很好……”^②

在南昌，意大利的人文主义者利玛窦与一位68岁的中国学者章潢³成了非常好的朋友。章潢品级高尚，在明朝的史书上⁴，他被写成是一位“从小到大没有讲过一句不好的话，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没有结交过一个不好的朋友，也没有读过一本不好的书”^⑤的人。他最重要的学术著作是《图书编》（一部地理方面的百科全书）⁶，此书共一百二十七卷^⑦。这部书的问世证实了利玛窦讲述的他与作者间友谊、他们的友谊带来的益处是相互的。这部书籍的大量条目都是在参考了利玛窦的讲解以后写成的，特别是天文学和制图学方面的条目。利玛窦绘制的世界地图用的就是这种制图法^⑧。

利玛窦通过章潢接触到了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了解了中国社会知识阶层的生活。这种接触对耶稣会士的传教带来了久远的影响。在明朝最后的五十年里，最重要的现象之一莫过于文学和哲学社团，或如耶稣会所称之“Academy”（学会），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

章潢是南昌众多最早结社中的一个社团的领头人。该社的人数大约在一千人以上。这些学者们经常几个人聚在一起，不但讨论文学，也研究当时的社会问题。

^{②③④⑤⑥⑦⑧} 这种形式的聚会在开始时并不是刻意地聚集的。这些读书人来到一起，是借《论语》中的一句话：“以文会友”，以期互相帮

助，为科举考试做准备。这些聚会起初丝毫没人耳目，但是后来发展成全国性的带有社会性和政治意义的运动。这些小组组合起来，形成了有数千学者组成的各种结社，其中最具有影响的一个大的结社称为“东林学社”。如果更强调其政治性的话，或称之为“东林党”。

在当时，朝廷的大部分实权被一群聚集在北京宫廷里的宦官把持。与此同时，朝廷里唯利是图的反动的官员们与这些宦官又结为朋党。两股恶势力使一个好的政府运作程序瘫痪了，也破坏了整个的政治结构。这种政治状况，是导致在17世纪的头十年里社会动荡不断增长的主要原因。正是这十年时期为明朝的覆灭铺设了道路。

诸多爱国的、清廉的知识分子面对现实社会的种种弊端，极度痛心和愤怒。东林学社成了他们振作精神的地方。在17世纪的头几年，这个组织演变成一个政治团体。在17世纪最初的40年里，东林党与反动的阴谋集团对于朝政控制权的激烈斗争，成为这段时期中国政治史的大部分内容。

在南昌，利玛窦通过引见，认识了学社的知识分子。他发现有一批对如何改良朝政深为忧虑的人物。他们其中一些人已开始反抗，反对旧式的奴隶般的顺从。正是这种顺从，枯竭了人们进取的源泉，使权力掌握在腐败的反动势力手中。这些乐于接受新思想的知识分子聚到了一起。利玛窦认识到，在这种社会气候中，他可以通过这些人作为媒介将一种新的理论介绍到中国来。

很多谈论利玛窦的文章宣称，与儒家学说的联合，是为了以此作为手段使天主教在传入中国时更容易一些。对这种辩解，无论是褒还是贬，都是不确切的。利玛窦在儒家学说中，排除了宋朝的唯物主义，寻求与天主教教义的接触点。如果说它是一个联合的问题的话，不如说他寻求的是与较为进步和有所在接受能力的、与学会团体有联系的学者型官员阶层的联合。利玛窦认为凭借这些人的威望，“或许可以消除某些人对新学说存有恐惧的心理”^⑨。

1 高斯塔，利玛窦的同乡。1574年加入耶稣会，先后担任过院长、宣教师、总务长等职。无神不补，利玛窦与梵蒂冈书信往来甚多。

2 章潢，字中潜，南昌人，嘉靖进士，主白鹿书院，执经从游者众，著有《图书编》等书。

3 《书影》卷一七：“章潢，自号楚老，口无非礼之言，身无非礼之行，交无非礼之友，言无非礼之辞。”

4 重要的《图书编》被收入《四库全书》，并不像本书作者所说是“一部地理学的百科全书”。它汇集了历史上所有可考的多方面资料，其中卷六十九至卷六十七为地理学著作。章潢将利玛窦绘制的《世界万国图》收入其中。本书作者章潢取利玛窦所绘的《世界万国图》和《真大万国图》。

即使是这样的结合，“联合”一词仍被误解。利玛窦看到以学会团体为媒介，天主教作为一种“发酵剂”可以被引入到中国社会。这个阶层可以形成许多向全国广阔的土地上扩散天主教思想的中心点。这并不表示利玛窦抱有使全部学会团体的成员都皈依天主教的期望。还有一些作者仍然坚持错误的说法，认为耶稣会寻求的是中国“从上到下”的皈依^①。利玛窦自然希望，“如果有可能”，他指出，“使一些有功名的学者和官吏皈依天主教”，但是他的更重要的目标，是通过这些人，形成一种对天主教抱有好奇的社会环境。

事情并非偶然，在明朝最后的40年，所有杰出的学者阶层的天主教皈依者和许多非天主教徒的朋友都是出自东林学社的社会背景。利玛窦的良好判断力由此得到了证实。徐光启（教名 Paul）¹、李之藻（教名 Leo）²、杨廷筠（教名 Michael）³，所有这些在后来中国天主教的发展进程中起到领导作用的人物，均出自这些学会团体^②。

传播天主教的利玛窦开始在学会成员中宣讲科学和哲学，这两者都是为了给具有影响力的天主教徒造出一种有接受能力的气氛的目的。传教士们在科学领域一定要有好的声望，不然会影响到天主教的传播工作。许多有价值的友谊，首先是因为利玛窦的声誉和其他的耶稣会士教授新的科学真理而赢得的。许多对于有着宗教教师声望的利玛窦可能会持冷漠态度的中国学者，但是面对一位著名的科学大师，利玛窦的力量却是不可抵御的。这样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即如果在科学方面有了共同兴趣的萌芽，很容易开出共同信仰的花朵。即使圆满的结果没有成为现实，至少能为信仰赢得富于同情心的帮助与保护。

到了1598年，当利玛窦打算离开南昌的时候，他的这种传教方式的主要思路已经拟定好了。从那以后，他将主要的精力投入到未来的进一步发展上。利玛窦一直在小心谨慎地摸索这一方法。他确信：在荒野中，他已经找到了一条唯一可行的道路。

利玛窦在南昌的最后几年的经历，使他获得了宝贵的经验。在学者们的讨论会上，利玛窦是一位很受欢迎的人物，因为在讨论中免不了要涉及到基本的宗教问题，还会引出进一步的提问。参与讨论的有些人是出于好奇，有些人则是希望从利玛窦这里学到神秘的炼丹术。尽管利玛窦一再说他不会炼丹术，但是这些人还是坚持认为他会。不过大多数来拜访他的人是希望从他这里学到更多的关于科学、哲学和宗教的知识与思想。“从早到晚”，他写道：“我一直忙于与人们讨论我们的教义，许多人渴望抛弃他们的偶像而成为天主教徒……”^③

在1595年，“作为一次中文写作的练习”，利玛窦编撰了一篇不大长的论文——《交友论》。这个题目很吸引中国学者。他们一向不知疲倦地讨论“三纲五常”这一孔子学说中有关道德理论的核心部分。这是一系列使孔子的声望名扬全中国的著作中最为重要的部分。在南昌，利玛窦还结识了两位住在南昌，属于皇室家族的王爷，并与他们建立了真诚的友谊。《交友论》就是为其中的一位王爷——“建安王”写的。这篇文章如此受欢迎，甚至还利玛窦自己也感到吃惊。许多学者争着想得到一册。有一位学者就将它刊印了出来。这之前，在其他的书中就已经提到这本书。三年以后，利玛窦从南京发回的信中说：

“与我们已经做过的一切相比，这本书为我，也为欧洲人赢得了更多的声誉。因为我们成功地制造了一些器械，我们在机械制造方面的才能已经受到了人们的赞扬；而这篇文章给我们带来的是有天分的学者、有道德的人的声誉。文章非常受欢迎，已经在两个地方出版了。”

这封信是写给他的朋友高斯塔的。在信中他还表达了他的烦恼，因为教会对这篇文章的审查严重地妨碍了他的工作。文章最后能够出版，应该归功于一名不透露姓名的学者在未经授权下的行为。谈到自己，利玛窦写到，“我不能发表这篇文章，因为要发表任何文章都要得到我们许多人的允许，对此我无能为力。这些做审查工作的人不在中国，也读不懂中文，还要坚持进行评审”^④。

1 徐光启（1562—1633），字子先，号玄扈先生，上海人，明代著名的科学家、学者，与利玛窦合作翻译了《几何原本》。

2 李之藻（1564—1630），字叔章，仁和人，万历二十六年进士，曾任太仆寺少卿，著有《天学初函》等书。

3 杨廷筠（1557—1627），字仲虞，号蔚园，仁和人，万历二十年进士，曾任夏原鼎史、顺天府经历、顺天府丞等职。

[1042] 利玛窦在多年之后,说,他的《交友论》已被重印多次。事隔三百九十年,在1914年的5月,《交友论》以连载的形式出现在《神州日报》¹上,足见它经久不衰的影响力。

利玛窦的《交友论》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展示了耶稣会在东方与西方相互了解方面所起的中介作用。利玛窦并没有自封他是这篇不长文章的原始的著者。当时建安王请他解释一下欧洲人对友谊的看法。写这篇文章的起因是为了满足建安王的好奇心。中国人习惯上排除了自己以外的所有人为“蛮夷”。让他们感到吃惊的是,这些“蛮夷”竟然在友谊这个话题上有如此高雅的论述。这使中国人感到很亲切,欧洲的文明程度在中国人的心目中的地位也一下子提高了。因此利玛窦的这篇文章不仅为他自己,也为欧洲人争了光。

在南昌,利玛窦决心为他传教使命找一个更大的地方,创造好一点的条件。1596年夏,通过很成功的交涉,他买到一所房子。这是他盼望已久的第二个立足点²。在开辟这个新定居点的时候,他下了决心,不再采用在肇庆和韶州那样的设立公开的礼拜堂的做法。

可以这样说,利玛窦这样做没有任何想掩盖他的宗教本质的企图。尽管这一结论是与普遍的说法相矛盾的。利玛窦通过自己的亲身经验体会到,在某种程度上,传教工作还必须要秘密进行。一些人劝告他,在一些最基本的工作没有准备好之前,一定不要急于做太明显的劝说人们信仰天主教的事情。在利玛窦的经历的这个阶段,他仍然认为,在传播福音一事得到朝廷的认可之前需要极为小心地行事。因此他决定在既不否认也不掩盖真实身份的状态下,不急于走在大众意识之前,而让人们知道他是在推行一种新的宗教。而且依照中国当时的环境,将许多人聚集在一起是十分危险的。那时,日本正在侵略朝鲜。中国人对间谍问题非常敏感。更重要还有,官场里的人惧怕国内秘密结社。因为大多数的结社都具有革命的性质,这是有先例的。人数达到某种程度的聚会都会引起猜疑,就像在罗马帝国的早期,天主教徒的聚会曾引起部分官员的怀疑,认为他们有

推翻当权者的企图一样。这种情况当时在中国也同样存在。一些书院里文人们仅仅有九个或十个成员聚在一起,就已经引起朝廷的警觉了。以后我们将看到,在首次偏离了利玛窦这种传教策略后,其结果就导致了一场对天主教徒的打击。在这种类似的打击再次爆发的时候,对南京天主教徒的主要指控是:这些天主教徒是臭名昭著的白莲教的教徒³。

利玛窦做出这一决策的主要动机,与他放弃佛教徒的服饰的动机是一样的。耶稣会的教士们曾一度被人们当成是佛教的和尚。利玛窦毫不犹豫地决定,在南昌扩大居留地时不开设公开的礼拜堂,因为他知道,在明朝的社会环境中,通过私人间的谈话或小范围的探讨来传播福音要比在公开场合传播福音更为有效。他这种想法在他的两封信中表露得十分清楚。其中一封是1596年10月12日写给他任罗马的朋友富利卡提(Giulio Fuligatti)⁴的信,信中在告知自己有了新住处后,写到:

“我不认为我们应该修建一座正式的教堂,而是代之以一间做讨论问题之用的房间。另一个厅则当作用来做私人弥撒的场所或做接待室。因为在这里,通过私下的谈话传播福音要比正式的布道效果更好,成果更显著。”⁵

三天之后,在写给高斯塔的一封信中,利玛窦讲述了他的主要动机:“我们已经不用僧人这个名称,而这个名称在中文里相当于我们语言中的修士……在初始阶段我们还打算建教堂或祈祷厅,而是有一个谈话室。”今天,我们称这种房间为讨论室。

事实也是如此,在肇庆和韶州的时候,耶稣会士在居住地设一公众聚会厅,有时会因此而招来不少是非。佛教的寺院或多或少被视为公众的财产,因而习惯上寺院也允许任何公民团体在寺院里摆设宴席。在一些寺院里,人们常能听见的是节日喜庆宴席间的寻欢作乐之声,而不是和尚们的诵经之声。当地的乡绅们认为,既然这些外国的神父们将礼拜堂建在他们这儿,就像和尚的寺院一样,没有理由不让他们使用。耶稣会士们也不只一次地因拒绝人们将礼拜堂用来做宴会厅的要求,而与

¹ 在上海出版的《神州日报》转载了《交友论》。

² 原文如此。但根据事实和作者后来的行文,这里似乎应该是指第二个立足点。

³ 富利卡提(1550—1633),系利玛窦在罗马学院的同事,后任耶稣会士,曾著有《论白莲教》,并讲述中国他在中国的利玛窦。

当地的人生发生磨擦。在肇庆的时候，有一次因为他们不让外人进来摆设宴席，将大门紧锁起来，结果导致了一次小规模的不满。^[147]任何人都可以到佛教的寺院里摆宴席，这种约定俗成的习惯也不知沿用了多少年，而耶稣会的教士们却将大门紧闭，将人们拒之门外，这种行为似乎违反了上述那种不成文的法律。

最终让利玛窦做出这个决定的还是因为发生了一件更为严重的事^①。事情发生在韶州，当时是由郭居静在这里主持工作。一天深夜，一伙一身酒气的人要强行进入传教士的住处。他们看样子不是本地人。仆人们将他们拦在了外面。他们就对仆人们连打带骂。第二天，这些人害怕郭居静会告诉他们，他们就恶人先告状，先将耶稣会士们告到了衙门，说他们受到欺辱。结果，衙门里一个职位较低的官吏办了个案子，将郭居静的两个仆人来打了一顿。当耶稣会修士钟玛仁为他们辩护时，不但遭到痛打，而且还被罚带上刑具在大会堂站了一整天。后来，由于其他官吏的干预，才为传教士一方讨回了公道。这位滥用权力的官吏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是因为他曾垂涎郭居静的一块表，但是没有得到手，因而迁怒于郭居静。后来，这名官吏向郭居静赔礼道歉，并在城里一家寺院里摆下宴席，用这由来已久的习俗表示修好。为了避免发生这种不愉快的事，利玛窦决定，在新的定居点初建的时候，不设立公开的礼拜堂或教堂。

南昌为利玛窦开始实施他的可能应恰当称为“分散式传教”的倡议，提供了首次机会。南昌城有许多学者，更重要的是其他地方有学问的人也经常造访南昌。它作为江西省的省会，也是全省学人乡试的地方。每隔三年，江西省参加举人考试的学子都涌入南昌。1597年12月，南昌有四千名考生参加从12月19日到29日的举人考试。就在这个月，利玛窦在给督教他科学课程的老教士克拉委奥的信里提到，当时拜访他的人非常多^②。接触更多的人，也是传教工作的一种方式。利玛窦生命的最后十年是在北京度过的。在这期间，他继续实行这种传教方式。这些学者们从北京返回各省后，他们与利玛窦之间诚挚的友谊，令人兴奋的谈话仍会留在他们的记忆中；对利玛窦所

称道的宗教信仰的同情和对天主教教义的兴趣也会被一道带他走。在利玛窦离开南昌之前，他在当时中国十五个省中的十个省里都有朋友。实际上，当时除去他在南京呆了不长的一段时间外，在十五个省里他只到过广东和江西两省。

尽管利玛窦在南昌的工作硕果累累，他仍然将目标锁定为北京。他在1596年10月13日写给耶稣会总会长阿桂娄瓦神父的一封信中说，他正在焦急地等待罗马方面的回信，不知罗马明室向罗马教廷要求向中国派遣一名大使的建议能否被接受。如果这个建议行不通，他将决心自己尽全力以赴地设法去北京^③。他认为这个想法是可行的。他在南昌结交的朋友里有些是显亲，有些人的亲戚在朝廷里做大官。他还认识一位北京地方官的三个儿子。

几封从日本的来信带来了消息：日本派遣使者去北京，与朝廷进行和平谈判。这位使者是一名很好的天主教徒。这个消息让利玛窦感到了不安，因为日本人的举动也许会对他的进京产生不良影响。这位使者名叫小西飞（又称小西行长），是一名重要的信仰天主教的领主，也是当时丰臣秀吉最信任的军官之一^④。

1598年的时候，教会方面发生了一些行政上的变化。大约在两年前，担任了二十二年各种职务的范礼安，经本人向耶稣会总会长申请，辞去职务。经总会长的批准，他的职务由印度的巡察使尼科罗·皮门塔(Nicolau Pimenta)接替。但是范礼安希望以后做一名普通的教士的愿望没能实现，因为总会长仍然让他担任日本和中国巡察使。

1597年7月，范礼安到了澳门，直到1598年7月才离开。这时在中国传教士的负责人是孟三德，而不是利玛窦。早在1583年，澳门神学院院长卡布拉尔(Cabral)就向总会长进言，劝说他不要任命罗明坚为中国传教团的负责人。他虽然感觉到，传教团的负责人在性格上不能太单纯，要多一些心计。在他写给耶稣会总会长的信里谈到罗明坚时说，罗明坚是一个品德高尚的人，“但不足以应付周围的环境”^⑤。耶稣会总会长就让

1651

范礼安任命一位比罗明坚更谨慎的负责人,范礼安选择了孟三德。1585年孟三德得到任命后,很快就来到了中国。但是由于他的健康状况不好,不能在中国停留较长的时间。1590年,他又被任命为澳门神学院院长^①。这是一种笨拙的行政安排。一直实际全盘负责在中国的传教工作的利玛窦,每迈出重要的一步都要经过孟三德的批准。澳门和内地相距遥远,孟三德对实际情况也不清楚,很难对问题做出判断。

这时,范礼安结束了这种不正常的局面。利玛窦被任命为传教的负责人,还被赋予了较大的权限;在印度呆过十年、任过各种职务的李玛诺(Manoel Dias)^②神父接替了孟三德,担任澳门神学院的院长。当时的耶稣会士们称他为老玛诺(Manoel Dias, Senior),以区分另一位小玛诺(Manoel Dias, Junior)。小玛诺在中国被称为阳玛诺^③,同样将在传教工作中起很重要的作用。李玛诺对在中国的传教事业的忠诚,对这个地区工作的进展来说,是个好兆头。范礼安随后派龙华民(Niccolò Longobardo)^④去韶州,加入郭居静与罗如望(João de Rocha)^⑤的传教工作。自从1595年12月起,利玛窦和苏如望(João Soeiro)^⑥就一起在南昌传教。

这一切都是为利玛窦进京所做的刻意的安排。范礼安这时便向利玛窦建议,尝试着去接近“在北京的朝廷和皇帝”。献给皇上的礼物也准备好了:一幅圣母玛利亚的画像,一幅教世主耶稣的画像,阿拉委瓦送的一座铜制自鸣钟,菲律宾马尼拉的主教也送了一座相似的自鸣钟。

在利玛窦开展工作之初,中国的政治就给他上了一课。他曾经过分估计了皇家成员的作用。在中国历史上,不少帝王是被皇族的成员推翻和取代的。明朝的统治者清楚这些历史。为了消除宫廷中的危险,朝廷一贯采用的做法是将诸亲王派往全国各地,赐给他们很高的头衔,享受奢华的生活,但是削弱他们的影响,使之远离权力。

当利玛窦接近建安王的时候,想通过他的帮助而进入北京。但他很快就知道了,“皇帝在行使权力时,不仅不用他的这

些亲戚,而且对他们还抱有强烈的猜疑心态”。利玛窦后来写到,如果继续走这条路,“不仅对传教没有帮助,也许还会带来很大的危险和伤害,甚至毁掉它”^⑦。

利玛窦在韶州期间,与朝廷里的一位高官——王弘海^⑧建立了联系。当时,王弘海由于厌倦了政教的阴谋倾轧,暂时辞去了南京礼部尚书的职务,返回老家海南。他在途经韶州的时候,与利玛窦相识了,两人畅谈了整整一天。王弘海想带利玛窦进京,对国家的历法进行改革。他做这件事的动机并非全是出于公心,他希望推荐利玛窦履历能给他本人带来荣誉,从而使他有可能出任北京的礼部尚书^⑨。

1598年,王弘海被召回南京,官复原职。在路经韶州时,他向郭居静询问利玛窦在什么地方。郭居静答应,将赶在王的前面去一趟南昌,告诉利玛窦王弘海要见他的消息。于是,郭居静和罗如望来到了南昌,两天后王弘海也到了。王弘海告诉利玛窦,要带他进北京。王弘海还说,9月17日那天,在北京的官员们要朝见皇上,为皇上祝贺生日。

1598年6月25日,利玛窦带着郭居静、钟鸣仁和正准备加入耶稣会的年轻的澳门人游文辉(教名 Manoel)^⑩,登上王弘海的船离开南昌。游文辉将在1605年时成为耶稣会辅理修士。1610年利玛窦在北京去世的时候,是他守在利玛窦的身边。与其他几位首批加入耶稣会的中国人一样,游文辉在当时也有另一个名字,曼努埃尔·佩罗拉(Manoel Pereira)。他是一位很有天分的艺术家,后来在北京的教堂里的一些宗教绘画就是出自他的手笔。在利玛窦刚刚去世后,他画了一幅利玛窦的画像,画得非常好。这幅画像现在悬挂在罗马杰苏(Gesù)教区的耶稣会士住所。

罗如望和苏如望留在南昌,负责这里的传教工作;龙华民负责韶州的传教工作。利玛窦在耐心等待了十六年之后,终于踏上了去一睹龙颜的路程。

① 李玛诺(1559—1639),葡萄牙耶稣会士,1595年来华。
② 阳玛诺(1574—1659),葡萄牙耶稣会士,1610年来华。
③ 龙华民(1559—1654),意大利耶稣会士,1597年来华。
④ 罗如望(1566—1625),葡萄牙耶稣会士,1598年来华。
⑤ 苏如望(1566—1607),葡萄牙耶稣会士,1595年来华。

⑧ 王弘海(1542—?),字少卿,号思庄,广东东莞人,嘉靖四十四年进士,历官南京礼部尚书。

⑨ 在当时明朝政府的中央机构里,修订历法的是钦天监,属于礼部的管辖。

⑩ 游文辉(1575—1630),澳门人,是一名画师。

1041

- ① 本章中关于这些事件的主要资料来自利玛窦自己的讲述，见他的回忆录。FR, I, 335—380页。所封长信，一封是1595年10月28日写给高斯藩神父，另一封是1595年11月4日写给耶稣会总会长阿涅亚神父，分别见 *Opere storiche*, II, 117—118页和182—213页。
- ② 解释一下中国皇帝上的命名方法：在皇上尚未登基时，以他自己的姓名和皇太子的头衔相称。等他做了皇上，他就有了个人的帝号，再加上他的统治时期的年号。明朝的大子朱明珰（朱是明朝皇帝的姓），称帝后的名字是神宗，他统治期间的年号是万历，可以称他神宗皇上或者万历皇上。西方的作家习惯用朝代的称呼作为皇上的名字。在这本书中对皇上的称呼通常用年号。
- ③ *Opere storiche*, II, 111页。
- ④ 同上, 201页。
- ⑤ 参考 FR, I, 360页，注释1。
- ⑥ 见 *Opere storiche*, II, 186页。
- ⑦ 被循礼贵引用，见 FR, I, 371页，注释5。
- ⑧ 用汉语拼音来表示“卷”而不英文“volume”，是因为在英语中“volume”对西方的读者来说意味着一部大部头的书，但是“卷”的形式十分古老，那时的书是以卷轴的形式出现的，每一卷可能是书的一部分或是一个章节，这就是“卷”的意思。
- ⑨ 参考美国国会图书馆藏《图书馆》。
- ⑩ FR, I, 382页。
- ⑪ 有一例取自 John J. Connidine, M. M. 著 *Across a World* (纽约1942年出版)，147页。这页的内容不仅对耶稣会在中国传教所运用的严谨的基本原则记述有误，而且也说理解早期罗马教会的传教原则。教会在开始的几年里，皈依天主教的人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罗马城中众多的古代纪念碑足以证明这点，例如与 Pudena 家族相关的纪念碑。教会的发展不是从一个方向，而是向社会的各个方向扩散。
- ⑫ 我得这几位教名的写在括号里，这样有些读者或许能认识一些在本书中出现的天主教徒。在读者对他们比较熟悉之后，我就不再用他们的教名，而用他们的中文名。也许无需再解释中国人的姓在前名在后，正好与西方的习惯相反。在书中的某些地方，有些中国名字我未能查到，只好用他们的教名，名在前，姓在后。
- ⑬ 见 *Opere storiche*, II, 220页。
- ⑭ 同上书, 243—250页。

1042

- ⑮ 关于中国人的秘密结社和官方对它们的恐惧，见 A. Wylie 著 *Chinese Researches* (伦敦1937年版)。
- ⑯ 见 *Opere storiche*, II, 215页。
- ⑰ 利玛窦在给高斯藩的信中提到了这件事，同上书, 230页。
- ⑱ 同上书, 242页。
- ⑲ 同上书, 225页。
- ⑳ 关于小西飞 (Kunishi Yukimasa)，参考 C. R. Boxer 著 *The Christian Century in Japan, 1549—1650* (但克力—伦敦，如所大学出版社—剑桥大学出版社, 1951年版)，181页。
- ㉑ 见罗马耶稣会档案9，II, 186页前后。
- ㉒ FR, I, 222页，注释1。
- ㉓ 同上书, II, 7页。

- ⑩ 同上书, 75页, 注释 5。
 ⑪ 同上书, 81页。
 ⑫ 见 *Opere storiche*, II, 243—250页。
 ⑬ *FR*, II, 94—95页。
 ⑭ *Opere storiche*, II, 479—480页。
 ⑮ 同上书, 289页。
 ⑯ S. Wells Williams 著 *The Middle Kingdom* (纽约 1883 年再版), II, 330页。
 ⑰ René Fülöp-Miller 著, F. S. Flint 和 D. F. Tait 译成英文: *The Power and Secret of the Jesuits*, (纽约 1930 年版), 245页。
 ⑱ A. Revillon 著 *La religion Chinoise* (巴黎 1889 年版), 670页。
 ⑲ *FR*, II, 59页, 注释 5。
 ⑳ 有一本很好的关于徐光启的传记概要, 见 *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 (1644—1912)*, 由 Arthur W. Hummel 编辑 (华盛顿 1943 年版), I, 316—317页。
 ㉑ 前面所引 S. Wells Williams 的著作, II, 293页。
 ㉒ *FR*, II, 250页, 注释 3。
 ㉓ 同上书, 253页。
 ㉔ 皇家协会会员李约瑟 (Joseph Needham) 著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剑桥大学 1959 年版), III, 457—458页。
 ㉕ 前面所引 Howbotham 的著作, 44页。

第五章 登上了“月球”

利玛窦前往北京的这次值得纪念的行程, 有一个好的兆头, 就是顺利地到达了山东省的济宁市。主管这支船队的刘太监十分高兴有耶稣会传教士这样的客人来搭乘他的船, 因为这些客人给他带来了便利^①。大运河是一条繁忙的水道, 挤满了船只, 就像 20 世纪突出的交通难题一样。给帝国朝廷运送供品的船队, 以及一些载有身负官方使命的重要官员的小船可以优先通过。在河道的船闸前, 其他的船只都要在一旁等候, 让他们先行通过。船闸的原理很简单, 但是操作很灵巧。船闸设在桥下, 是木制的, 将水拦住, 直到水位上升到能够使船通过的高度。这一开闸和关闸的过程和众多的过往船只, 使得那些没有特权的船只往往要在船闸等候四至五天。而有了特权当然就不一样了。那个领队的刘太监发现利玛窦是位非常有用的人物, 可以使他的船队避免烦人的等候。他请那些等候过闸的船老大来见他船上的来自西方的客人利玛窦, 以及要进贡皇上的礼物。这些船老大看在这位非同一般的外国人的面子上, 接受了领队太监的请求, 很爽快地答应让他的船队排在前面。

在济宁, 利玛窦受到了热情的接待。他还见到了送给他题有诗句的扇子的老朋友李攀。李攀这时住在仓运督办刘东星^②的豪华的府第。仓运督办是个要职, 其权力和地位与巡抚相当。刘东星是位很有能力并且十分正直的官员, 他在朝廷里身兼数职^③。除了仓运督办之外, 他还担任工部尚书和都察院右金都御史。

刘东星不仅从李攀那里听说过利玛窦, 而且他的儿子也提到过利玛窦。刘东星的儿子与在南京的耶稣会士有很好的关

① 刘东星, 担任光禄寺卿, 自万历二十七年三十九岁 (1599—1601) 任工部尚书, 兼都察院右金都御史, 是理河堤, 兼管军政。

系。当刘东星得知利玛窦到达济宁时，便派出一乘轿子，将利玛窦接到他的府中。他还在当天来到利玛窦的船上正式回访。这一举止在济宁城引起很大的震动。他以极大的兴趣仔细观看了利玛窦准备进贡给皇帝的礼物。临走时，他邀请利玛窦第二天再次到他家里作客，利玛窦答应了。第二天在刘东星家里作客必定给利公留下了长久的美好记忆。那是非常愉快的一天，在座的有刘东星的几个儿子和好友李贽。至于主人的款待，他这样写道：“每一位在座的人都和藹可亲，我好像不是在地球的另一端，也不是在异教徒中间，而是在欧洲，在虔诚的亲密的天主教徒中间。”^[37]

刘东星对利玛窦携带的在南京写好的给皇帝的奏折不太满意。他又重新起草了一份，并让济宁城里书法最好的人誊抄出来。最后，他还为利玛窦给在北京的朋友写了几封信。后来的事实证明，这几封信对利公来说，比南京的朋友所写的信更有用处。

利玛窦依依惜别了几位好友。他希望有一天能够回报他们，将他们引导上信仰天主教之路。但是他的愿望没有实现。刘东星在分手后半年就去世了，享年64岁。又过了一年，75岁的李贽被召入北京，遭到蔑视“正統”的新儒学的指控。李贽不愿意接受流放的惩罚，也不想在他的老家福建再受到审判，就以自杀了却了生命。

离开济宁后，利玛窦的好运也随之消失。1600年7月3日，他所在的船队到达了仍属于山东的临清。利玛窦和他的同伴落到了一个名声狼藉的太监手里。他叫马堂，负责税收事务。为了摆脱马堂的高额盘剥，刘太监将耶稣会士们交给了马堂，并且告诉马堂，他们携带着给皇帝进贡的值钱的礼物。刘太监和耶稣会士也有相处得不错的时候，利玛窦搭乘他的船，使他一路上得益不少；他留下了在南京从一户饥民家庭中买了一个10岁的男孩。这个男孩成为庇迩我的汉语教师。

马堂是个极为危险的敌人。甚至临清的驻军将领钟万禄都警告利玛窦，在与马堂打交道时必须万分小心。钟万禄是利玛

窦早在韶州时就认识，而且在南京时又进一步建立友谊的老朋友。钟万禄对当时的中国政局的看法十分悲观，他认为，“太监们是中国真正的统治者；皇帝离开他们，什么事情也办不成；在中国，哪怕最有权势的人物对太监们做的坏事也无能为力”^[38]。

在这以后，利玛窦一行度过了六个月令人沮丧的日子。在临清呆了几个星期之后，他们被送到天津，在那里等候皇帝的回信儿。马堂向北京递上一份奏折，禀告皇帝有外国人携带贡品要求进京。在头几个月里，这个粗鲁而又没有理性的太监，对利玛窦等人表面上还算尊重。从北京来了回信，说要一份利玛窦携带的礼物的清单。马堂又写了第二道列出了清单的奏折。可是几个星期过去了，北京方面对第二份奏折没有答复。这时，这个太监开始害怕了，皇帝是不是不高兴了？于是他对利玛窦等人的态度一下子就改变了。三名耶稣会士被关在天津的一座庙里，外面有卫兵日夜看守。

形势的发展让人绝望。马堂借口说利玛窦没有将所带的礼物全部开列出来，就带着天津驻军将领及士兵将利玛窦的所有行李都打开检查。当他们发现了一个十字架的时候，马堂大叫起来。十字架上钉着一个裸体男人，流着血，暴露着伤口。他认为，很显然这些外国人想要用这个有魔力的十字架将皇帝咒死。

据庇迩我说，他们向马堂充分地解释了十字架上的人物是怎么回事。马堂问：“这是什么？”庇迩我说，“我们告诉他，这是真正的神灵。是他造就了天地，全世界都必须崇拜他。是他为我们的罪而死，是他给了我们生命。他死之后，凭借他自己的力量，从死亡中复活，升上了天堂。”^[39]

因为庇迩我到中国刚刚几个月，很难用流利的汉语宣讲耶稣拯救人类的道理。同样，他也听不懂利玛窦对马堂说了些什么。庇迩我写这件事时，将它略微戏剧化了。因为他的这封信是寄往耶稣会托莱多(Toledo)^[40]省教区的，这样写不会有什么害处。

利玛窦非常清楚，也非常有经验。他知道，当中国人面对十

[37] 托莱多，西班牙中部的一个城市。

字架上的耶稣像时，是没有思想准备的，不可能立即理解其中的含义。这样的解释就像是火上浇油。无疑，正确的还是利玛窦自己的看法：“不要希望告诉中国人这是我们的神，在那种环境中，要让对天主教教义无知的人深刻地解释这个神秘的事情，似乎是困难的，尤其是讲给太监听，他们会认为我们是在欺骗……我开始一点一点地向兵备道和其他人解释，这是伟大的圣人，他为了我们而遭受痛苦和被钉上十字架的。为此，我们制作了代表他的雕像和画像，使我们能够经常在看而看到他，这样我们就可以为我们得到的巨大恩典而感谢他。”^①

情况简直糟透了。利玛窦的解释没有起任何作用，似乎所有的东西都要失去了。钟鸣仁，和利玛窦一同进京的耶稣会修士，设法从被关押的庙里脱身，跑到北京。他找到了利玛窦的一些朋友，请他们相助。但是他们惧怕太监的权势，不敢插手这件事。他们甚至还劝告耶稣会士们，为了保全性命，干脆将所带的全部行李当作礼物送给马堂。他们说，要想将此事禀告皇帝是办不到的，因为皇帝所有的事情都要通过太监。利玛窦的朋友钟万禄断言，他们此行不会成功，力劝他们回到广东去。但是利玛窦和庞迪我却不愿意这样做，不管形势怎样令人失望，希望总是不能放弃的。“看来不再有任何希望得到人们的救助了，”利玛窦写道，“他们坚持不懈地祈祷，请求神的帮助，同时也准备着面对任何可能发生的不测。他们心平气和地等待着由于马堂带来的迫害而为事业献上生命。”^②

就在山穷水尽的时候，谁也没有想到，皇帝的圣旨来了，日期是1601年1月9日。圣旨要求立即将外国人及贡品带到北京。这次长时间的磨难终于结束了，然而在帝國的京城里还有新的考验在等着他们。

1601年1月24日，利玛窦一行来到北京。他们发现他们陷入各政治派系斗争的漩涡之中。按照通常的行政程序，有关外国人的事务应由礼部的主客司掌管。主客司是礼部下属的四个部门之一。考察来访者的目的，将贡品进献给皇上，并就给予他们何等规格的接待向皇上提出建议，等等，是这个机构的职

责。但是太监却想绕过这个程序，他们的动机是希望能够分享皇帝赐予外国人的赏金，同时无疑也为礼部官员的受阻而恶意地暗自高兴。

一些文章不着边际地描写利玛窦如何用狡猾的手段潜入宫廷。但事实情况并不那么有趣，与这些流行作家的罗曼蒂克的描写也相去千里。米勒先生以超常的想象力和远离事实的情节编织了他的故事。米勒将利玛窦头十八年在中国的经历一笔而过，给人造成这种印象，即利玛窦在到达中国后，使用了一些骗术，得以在很短的时间内进入北京^③。米勒是这样描写利玛窦进京的：

“他独自居住在都城之外，在与一位高级官员混熟了之后，他请求将一封信和一件礼物带到宫廷内，送给皇帝。这件礼物是一座精致、美丽的欧洲风格的时钟。”

“这位中国官员带着传教士的礼物来到皇宫的一个大门前，将礼物交给值班的官员。起初，这个官员犹豫了好一会儿，不知是否应该将礼物呈上。便是当他仔细打量了这个时钟之后，觉得这个礼物太奇妙了。他把他的上司叫来，让他观看。就这样，利玛窦进贡的时钟在官员的手里逐级传递，一直传到最高级的官员，最后终于到了皇帝手中。”

“甚至作为‘天之子’的皇帝，也从没见过这种上发条的时钟，他龙颜大悦，兴奋不已。不过，出于皇帝的尊严，不便打听送礼人的情况。第二天早晨，时钟突然停止了。皇帝叫来一位大臣，让他使时钟重新走起来。但是这位大臣尽了一切努力，也是徒劳。整个皇宫里的人轮番来试，但是没有一个人能使时钟动起来的。”

“终于皇帝不得不亲自垂问，谁是时钟的进贡者。这个问题从上到地追问，一直到了守门人。（皇帝问皇后，皇后问挤牛奶的女工！）在找到进贡的人让时钟重新走起来之前，皇帝的心总是踏实不下来。”

“就这样，机敏的利玛窦博士在两个朝廷官员的陪同下，穿过几道皇宫的大门。大门门口的台阶是用大理石制成的，两侧

¹⁶⁰¹

¹⁶⁰¹

着伪装成使者的外国人，等候着皇上的接见。其实这些人都是只对做生意感兴趣的商人。他们谁都明白彼此的目的，但是互相之间有一种默契，谁也不敢穿对方的身份。

这种假装使节的把戏始于永乐皇帝(1403—1424)¹。他是一个爱慕虚荣的皇帝。他向周边国家派出一些使臣，邀请外国人到刚刚定都的北京来朝贡，并向他表示臣服。商人们有了发财的机会自然高兴异常。从此所谓“使节”源源不断地从远东和近东的每一个国家涌入北京。在北京尘土飞扬的大街上，商人们的骆驼、马匹和大篷车成了常见的景观。不过在皇城范围内，他们的活动是受到严格限制的。

利玛窦在这些圈栏般的房舍里，见到了七十多个从中亚国家来的穆斯林。通过与他们的交谈，利玛窦找到了更多的证据，证明现实的中国与马可·波罗笔下的神秘的“夏丹”是同一个国家。

部分所谓的“使臣”还会受到皇帝的召见，这是一种荣誉。利玛窦和庞迪我在这里住了几天之后，也参与了一次朝廷的召见。身着华丽官服的官员和穿戴礼仪服装的外国人，组成色彩斑斓的队伍。队伍的两旁排列着几千名士兵，由几头动作迟缓的大象引路。在东方的天际刚刚露出一线曙光的时候，受召见的人就来到一座足以容纳三万人的雄伟的大殿里。在许多年以前，皇帝是亲临大殿接见来使的，但是从1585年起，万历皇帝几乎断绝了与外界的所有接触。因此，当利玛窦被召见时，皇帝并不在场。他们面对皇帝的宝座进献礼物，行三拜九叩之礼。利玛窦看到一些使臣进献的礼物忍不住笑了起来。这些“礼物”有破旧的铁剑、自制的护胸甲、骨瘦如柴的一到了北京就饿得几乎要倒下的马匹。这种浮华的仪式要耗费很多钱。朝廷要供应这些“使节”喝酒、吃饭和娱乐，临走还要赐予远远超过他们进贡的贡品的礼物。所有的这些花的都是国库里的钱。

在招待外国人的馆舍(即会同馆)里，利玛窦和他的同伴受到了很好的照顾。他们被安排在一间特殊的房子里，有床、桌子和椅子，还有另外一间房子供他们做弥撒。蔡献臣设宴款待他

们。作为回报，利玛窦他自制了几件科学仪器送给他：一个地球仪、一个四分仪和一架星象仪。当得到这些仪器时，蔡献臣非常高兴。

利玛窦十分高兴能从马堂牢中逃出来。太监与朝廷官员的争斗会使他定居北京的打算落空。而礼部有侍郎来国祥²！是反对他们定居北京的。他派出好几个属下，接连几天向利玛窦他们盘问各种问题，特别是问他们来中国的动机是什么。因为问题带有法律的性质，他们得到的回答都很明确。利玛窦写道：“不管是口头还是笔写，他们的回答都是：他们是被上级派来传播天主的律法的。他们已经在帝国生活了好多年。他们来到北京，向皇帝进献礼物，以示对皇帝的尊重。他们不想做官，也不要什么回赠，仅仅希望请皇帝恩准他们继续在中国、在北京居住下去。”³为了答复来国祥提出的他们传播的宗教的基本教义是什么的问题，利玛窦送给他一本有关他讲道的抄本。这可能就是《天主实义》⁴一书。

朱国祥在给皇帝的奏折中，严厉地批评了马堂的越俎代庖，插手本来应属于礼部的事务。鉴于利玛窦等人是外国人，尽管没有遵守相关的法令，也是可以原谅的。只要将他们送回广东，然后遣送出境就行了。但当几个星期过去后，他的奏折没有得到回音。他开始有点害怕了，是不是做得太过分了？他改变了对利玛窦的态度，允许他在城里活动和拜访他的朋友们，不过还是要到礼部派来的仆人的陪同之下。在真诚接待利玛窦的朋友之中，有一位叫曹于汴⁵的重要官员，他是北京的史料给事中。利玛窦在到北京后的第一个月就结识了他，从此两人成为莫逆之交。后来，在利玛窦所著的《畸人十篇》中，曹于汴是其中发问之人之一。¹⁶⁴¹

朱国祥接连五次向皇上呈奏折，陈述他让利玛窦离开北京的理由。这些奏折的语气比第一份要缓和许多，不再坚持遣送利玛窦出境，而是改为将他们送回南方。但是所有的奏折都没有得到回音。

是什么原因使得皇帝会如此宽容这几个外国人？一份中文

1 朱国祥，字茂卿，号泰庵，南山人，万历十一年中状元，授编修，历礼部右侍郎。

2 曹于汴(1558—1634)，字自鹿，号石湖，安徽人，万历二十

1 永示皇帝，即明成祖朱棣，明王朝的第三位皇帝。

原始资料说，皇上念及他们是从如此遥远的地方来到中国的。《明史稿》说：

“皇帝对利玛窦自遥远的地方而来，甚为高兴。皇上赐于他住处、俸禄和礼物，对他十分关照。皇帝的态度使得一些显赫人物和朝中高官对利玛窦十分敬重，并与他建立联系。从此利玛窦安定下来，不会再被赶出北京了。”^①

皇帝的宽容态度，部分的原因是他站在与朝臣们作梗的太監一边。1573年10岁的万历皇帝登基。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昏君，沉溺于酒色之中。他周围的人除了嫔妃之外，就是成千上万的太監。他与外界隔绝，不离开皇宫一步。

从1588年开始，以皇帝和太監为一方，以爱国的学者和官员为另一方，围绕着皇位继承权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朝臣一方坚持幼皇上封长子朱常洛为太子；而皇帝在太監的支持下，则希望指定其幼子作为皇位继承人。这一幼子的母亲是皇帝的宠妃。在内阁、检察机关和六部官员不屈不挠的斗争之下，皇帝最终还是放弃了自己的主张。1601年11月11日，他宣布朱常洛为太子，将继承王位，尽管他后来又后悔了。

利玛窦到北京的时候，是这场长时间的争斗正处于关键的时刻。这时的皇帝正面临着群臣的压力之下，很难对反对他的朝臣有什么好感。借用利玛窦这件事，正是打击与他作对的人的一个机会。

不管出于什么动机，皇帝确实是希望利玛窦他们留在北京的。在皇上奏折中没有提出让他留下来的时候，他就不予理睬。按规定，只有礼部才可以提出这种要求。在几次奏折中都没有这样的建议，他就以将奏折“留中不发”来回答。

就在事情陷入僵局的时候，最终还是朋友们把利玛窦解救出来。他们强烈反对朱常洛将利玛窦扣留会在会馆中。曾于非常愤怒，要求释放利玛窦，并给予他在北京城里居住的自由。

迫于这些压力，同时也感到皇帝对他的奏折留中不发而表现出来的不满，原本主要是针对马宝抽手礼部的事务而对利玛窦一行抱有敌意的朱常洛却却了。1601年5月28日，耶稣会士的

磨难终于结束，这时离他们从南京出发之日已经历时一年多了。

这样，在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忍耐和不懈努力之后，利玛窦达到了他预定的目标。一位史学家评论道：“从未见过这样的传教者，用如此的勇敢、执着和机敏，并且运用了世俗的处世方法，投身于一个伟大的目标。”^② 上述评价还不是历史中的真实的利玛窦。历史中的利玛窦是一位极为勇敢、有良好的判断力、处世不惊、有无可动摇的信念和伟大博爱精神的人。

① 这名太監的真实性尚待确定。利玛窦称他 Liopius。这位太監的名字

可能是 Lu P'u-hia (疑为冯惟哲——译者注)。采用历史上的人物的名字并不奇怪。冯惟哲是元代一位著名的女艺人。以太監的背景来看，正如德瓦尼翁的看法，这名太監可能会用一个妇女的名字，见 FR. II, 101 页，注释 2。

② 同上书，在 103 页，注释 2 中谈到他的生涯。

③ 同上书，305 页。

④ 同上书，109 页。

⑤ 耶稣会士范德普著 *Relacion de la entrada de algunos padres de la Compañia de Jesus en la China, y particulares sucesos que tuvieron, y de cosas muy notables que vieron en el mismo Reyno* (西班牙巴伦西亚 1606 年出版)，41—42 页。

⑥ FR. II, 116 页。

⑦ 同上书，119 页。

⑧ 见前面所引 Fabre-Müller 之著作，242—243 页。

⑨ 见前面所引范德普之著作，33—34 页。书中列出了礼物的清单，他将礼物列在“不太重要的物件”之下，详细的清单见 FR. II, 123 页，注释 5。

⑩ 这道奏折由艾儒略收集在一个集子里，1638 年在福建发表。德瓦尼翁对这道奏折做了摘要。

⑪ FR. II, 134 页，注释 6 中列出了每首拉丁歌的名称。

⑫ 同上书，146 页。

⑬ 参考 *supra*, 39 页。

⑭ FR. II, 151 页，注释 4。

⑮ 见前面所引 A. Reville 之著作，665 页。

第六章 收获

(187) 在传言中，一直有人说利玛窦与万历皇上有密切的来往，其实他从未见过皇上。是利玛窦自己写下了这一传言的起因。在他从招待外国使节的“会同馆”放出后不久，已经在朝野闻名了的自鸣钟不走了。四名负责管理自鸣钟的太监将它们抬到耶稣会士们的住处，让他们修理。在修理期间，利玛窦的许多有地位的朋友都来参观。皇上知道后，下了一道命令：今后自鸣钟不许拿出宫。如果需要修理，这几个西方人可以进宫。“从此，”利玛窦写道，“就有了一种说法，说是皇上对神父们格外的仁慈。还说皇上与神父们极为愉快地交谈。其实没有这回事。但是消除这种说法不容易，因为全中国都传遍了，说皇上经常和神父们友善地谈话。其实，即使是大官也是见不到皇上的。”^①

利玛窦成功地到达了明帝国的首都，实现了他长久的愿望。在对现实中的政治形势有了第一手的了解之后，利玛窦产生了修正传教策略的想法。就像我们已经了解的，几年来人们一直在说利玛窦：要想在中国传播天主教，最重要的是要获得皇上的赞同。有了这把保护伞，刚刚起步的教会就能躲开那些不友好的官员的干涉。传教事业一旦获得了皇帝的同意，就可能形成一个皈依天主教的运动。但是利玛窦亲眼看到了皇上的真实情况：万历皇上不是一位有权威的帝王，而是一个腐败、懦弱、懦弱的君主，是一个行将灭亡的帝国统治者。整个帝国被一群太监把持着。

据德迪我估计：当时宫廷里的太监，总数是 16000 左右。在 1602 年，朝廷要招募 3000 名太监，结果有 20000 人应召。在北京的皇宫中，太监随处可见^②。他们的大多数既无知又愚蠢，但

也是不乏聪明人。然而由于他们的道德水平很低，这些聪明人更具危险性。他们之中有的掌握了相当大的权力。有几个太监还是愿意当有道德的人的。在明朝的最后几年，这些人当中有的成了优秀的天主教徒，其中最出名的是庞天寿（传教士们在信中都称他为 P' an Achilles），他以品德高尚、忠于明朝而闻名。

在当时，腐败、丑恶的现象比比皆是，像庞天寿这样的人实在是稀少。利玛窦认识到：要想从皇上那里得到诏书是徒劳的，皇上只是太监手中的工具。因此必须采取不同的策略。

每个人都清楚，没有皇上的认同，住在北京是不可能的。传教士们在北京得到定居的认可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皇帝接纳了天主教。所以只要皇上默许他们在北京住下，也就表示接受了传教。在中国，要想办成事情往往需要迂回的策略，而不是直来直去。如果对一些问题的给予肯定的、明确的答复，皇帝害怕会招来反对，因此他可能就不愿意讲明。在中国的政体下，可以将上级对某种局面的沉默态度，解读为允许和同意；如果还要向上级正式地申请，反而会遭到拒绝。其实这种情况也不止限于在中国。

利玛窦认为，从今以后的策略更应注重智力传教。在京城，并以京城为起点，建立一个遍布全国的高层友好人士网络，同时也要在大众中传播天主教。与之相伴的、间接地受益于该策略的传播福音的工作和吸收天主教徒的工作，也要同时在北京和其他省份展开。总的方针有了，执行的方法是：静静地渗透和在文化上的适应；要摒除“欧洲人主义”；与欧洲人，特别是与澳门的葡萄牙人的接触，要保持在低水平上；传教工作需要资金可以从中国获得。只要在资金上还必须求助澳门，就要“小心从事，尽量少用”；当在天主教义上不存在妥协问题时，避免同中国人的偏见和猜疑发生不必要的冲突；传教的工作要“慎重、不声张，用好的书籍和有理性的辩论向学者证实我们教义的真实性，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宗教是没有害处的，只会给帝国带来好的朝政和平安的局面”；在发展天主教徒时，强调质量

(187)